

華僑歷史論叢

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编印



華僑歷史論叢

(第四輯)

梁康生 蔡仁龍
李國樸 郑炳山

主编

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編印

一九八七年十月

目 录

(一) 总结经验，开创我省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新局面	黄 献 (1)
(二) 近代亚洲移民的经纬	郭 梁 (11)
(三) 马来西亚种族间经济差距的形成及其性质	汪慕恒 (37)
(四) 试论林绍良企业集团的形成与发展	蔡仁龙 (55)
(五) 独立后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变化的特点及其当前处境	林伍珖 (96)
(六) 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与华人经济	汪慕恒 (124)
(七) 泰国的华人金融财阀	陈大冰 (142)
(八) 新加坡华侨银行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	王 勤 (154)
(九) 黄庆昌、黄祖耀与大华银行	李 松 (166)
(十) 七十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各种族间财富转移问题初析	拜玉明 (182)

(十一) 关于对华侨、华人资金估计的一点看法	郭 梁 (194)
(十二) 美、澳两洲华侨、华人的新动向	陈碧笙 (208)
(十三) 略论马来亚契约华工制的发展与变化	吴风斌 (225)
(十四) 痛定思痛——1967年缅甸排华起因初探	林 竹 (240)
(十五) 福建省侨汇的历史和现状	吴同永 (254)
(十六) 福建省近年来华侨回国投资特点析论	黄英湖 (273)
(十七) 福建省惠安县引导华侨参加祖国建设问题的探讨	李天锡 (291)
(十八) 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纪要	(303)
编后记	(309)

总结经验，开创我省华侨华人 问题研究的新局面

——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 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黄 献

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自1984年2月举行以来，已有三年半了。这三年多来，我们学会在党的领导下，在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省社联、省侨联及各有关研究团体的指导、支持和协助以及广大会员的共同努力下，本着学会的章程和宗旨，开展及推动华侨历史及现状问题的研究，做了一些工作。借此机会，请允许我代表第一届理事会将工作情况作一个汇报。

大家知道，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是1981年12月成立的。廖承志生前十分重视华侨史及华侨问题的研究工作。当时他在百忙之中，在下雪的严寒天气下，于12月19日到华侨饭店来接见了全体代表，并作了重要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华侨历史学会工作很需要做。我们中国已经到时候了，应该写出几本华侨史来。”“我们需要把全世界华侨的历史写出来，特别是东南亚的华侨史和南北美洲的华侨史要首先写出来。这样才能使国内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什么是华侨。”“我们应该从历史方面进行分析，使他们知道华侨是怎样形成的。”“写出来对于团结全世界各地的华侨，对于

促进国内的安定团结，对于教育子孙后代，都有好处。”我们觉得今天我们在这里重温廖承志同志这些讲话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他的号召下，几年来，在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领导同志们的努力推动及协助下，我们看到，全国华侨历史及现状的研究取得空前的发展。广东、福建、上海、广西、云南、浙江、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及河北等省、市先后成立了华侨历史学会，有些地、市县尤其是广东省的许多市县也成立了华侨历史学会，涌现了一批专业及业余的研究人员，很多归侨和侨务工作者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几年中全国出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去年七月，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时不完全统计，近四年，是国内各种报刊上刊载的有关华侨史论文文章四百多篇，公开或内部出版的侨史专著、资料、传记、工具书和以华侨历史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共四十八部，约一千三百五十万余字。其中如《华工出国史料》、《陈嘉庚传》、《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等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从去年七月到现在，据我们所知又有几部专著和译著已经出版和正在印刷出版中，这些情况表明，我国华侨史及华侨华人现状问题的研究形势是好的，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也正是在上述的号召和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几年来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也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果。主要表现在：

一、研究机构和队伍有所扩大

漳州和泉州两地已先后成立了华侨历史学会，厦门市正

在筹备中，集美成立了陈嘉庚研究会。专业研究机构除南洋研究所外，省社科院有华侨研究所，华侨大学成立了华侨研究所、福建师大建立了华侨研究室、厦大成立了陈嘉庚研究室等。一些地区的侨办侨联结合工作成立了研究小组。特别是近一年多来，全省范围内各地县开展了编写侨务志和华侨志的工作，吸收了一批专业或业余的工作者参加研究和编纂工作，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后备力量。据不完全统计，本省各有关机构从事华侨史或华侨现状和问题有关的专业和业余研究工作者有一百四十余人。这支队伍虽然不大，远远不适应我省具有全国华侨、华人人数第二位的地位及繁重研究工作任务的要求，但在我省已初步形成了一支这门学科研究的骨干力量。

第二、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先后出版。自1984年2月学会成立以来，我们把推动科研及出版会员研究成果当作一项主要任务来抓。近几年来我省的华侨史及华侨问题的研究，在会员们的积极努力，辛勤劳动，深入钻研下是取得可贵的成果的。重要的成果包括出版了：

1. “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译著)
22万字 1984年 福建人民出版社
2. “印度尼西亚华侨史” (专著)
50万字 1985年 北京国家海洋出版社
3.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 (福建卷)
36万5千字 1984年 福建人民出版社
4. “陈嘉庚年谱”
19万6千字 1986年 福建人民出版社
5. “侨魂——陈嘉庚文学传记”
1986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

6. “华侨抗日战争史料选辑”

50万字 1987年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和福建省党史
征集办出版

7. “契约华工史” (专著)

33万字 1987年 江西人民出版社

8. “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 (译著)

17万字 1987年 厦门大学出版社

9. “华侨资本简论” (译著)

12万字 1987年 厦门大学出版社

10. “福建省收藏华侨华人图书联合目录”

正在排印之中。

这些专著都是1984年以来出版的，这以前出版的没有统计在内。这些专著总计有二百五十万字。它们的特点是：

1. 在全国华侨史及问题研究中具有突出的特色。

2. 这些论著或译著在我国历史上都是过去从未出版过的第一部华侨史论著，填补了我国华侨史及华侨问题研究的一项空白。

3. 这些论著和译著都具有一定的质量和学术水平。上面曾提到去年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的报告及华声报的报导列举的四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中，就有我省的《陈嘉庚传》、《印尼华侨史》和《华侨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三部。当然，这不等于其他各地出版的论著学术水平不高，只是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而已。但我们认为，这是对我省侨史工作者工作的一个肯定、一种鼓舞和鞭策。

其次，本学会自成立以来，在缺乏经费来源的情况下，想了各种办法筹集一些经费，由秘书处主编及出版了《华侨历史论丛》，84、85及86年各出版一辑。《华侨历史论丛》

收集编辑了近几年来本会会员一些重要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三集共编辑了论文共76篇约85万字。《华侨历史论丛》的出版，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检阅了我省和学会会员们的科研成果，而且给全国各地的侨务部门，侨务工作者及教育部门作为工作及教学的参考，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并获得了一定的好评。暨南大学著名历史及华侨史专家朱杰勤教授在看了论丛后，亲笔来函对论丛内容及成果加以赞扬。厦门市中国民主同盟受民盟中央的委托，去年及今年举办了两期华侨工作讲习班。参加的有来自全国各省、市、县的政协、统战、侨务、民主党派等机构的许多负责和领导干部，他们竞相索要《华侨历史论丛》，认为其内容丰富，对他们的工作及宣传、了解华侨历史及现状有不少帮助。

除此之外，龙溪华侨史学会编辑出版了“龙溪华侨史”。泉州华侨史学会先后出版了三集《侨史》专辑，泉州华侨史料编委会出版了三辑“泉州华侨史料。”集美陈嘉庚研究会出版了“陈嘉庚研究论文集”，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出版了一辑“华侨史论文集”。

第三、加强与国外学术团体和学者的联系与学术交流。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有些研究华侨史和现状的外国或华人学者先后到我省访问并与有关单位及本会会员们进行了座谈及广泛的学术交流。有些是我们学会与东南亚学会接待，有些是有关研究机构接待，本会会员参加。如由新加坡南洋学会副会长率领，三位新加坡大学高级讲师参加的新加坡南洋学会代表团，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代表团，美籍华人史研究学者麦礼谦夫妇，日本的游仲勋，滨下武志，市川健二郎，市川信爱，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

洲太平洋学院院长，现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澳大利亚的学者颜清渥，杨进发，荷兰的黄隆泰，法国亚洲研究中心的顿巴、萨蒙夫妇、加拿大的朱维信，菲律宾亚洲研究中心的施振民，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华裔宋拍拉森等等。这些联系和学术交流对我们了解世界华侨、华人问题研究概况，他们的研究方向，兴趣和主要观点，介绍我省华侨研究状况及观点，促进学术交流和友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还应一提的是南洋研究所华侨研究室与日本宫崎大学市川正爱教授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作协议，共同进行了“华侨教育的比较研究”，研究成果已在去年发表于日本宫崎大学“社会科学”第60号上，去年起市川正爱教授又与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共同合作进行华侨学生情况的调查研究，现仍在进行中。

第四、加强学会的研究基础工作。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省华侨史及华侨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做好一些必要的研究基础工作是必要和重要的。为此，1985年12月，我们和福建省东南亚学会共同在泉州举行了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工作会议，到会的除两学会的理事（部分请假、缺席）外，还邀请了一些研究工作者参加。这次会议回顾及总结了福建省几年来华侨华人研究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总结了经验，商议了一些办法，会议决定：第一，设立华侨华人问题研究资料中心，暂设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第一步是编印全省有关的华侨华人问题的书刊资料目录。提供给广大会员参考。参加的有本省十二个有关单位。为了做好这个编目工作，还委托南洋研究所主办了一期资料人员培训班（不收费）对十二个单位的资料人员进行了华侨问题及统一编目

的学习和讨论。现在这十二个单位参加及提供的中、外文书刊目录已经编就和校审，正交厦门大学出版社承印出版发行。第二，编辑出版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丛书。这套丛书选登国内外学者有价值和一定份量的专著，论文集或译著。计划每年出二至三部。经过1986年的筹备及组织工作，在省侨联及省社科院等的大力支持下，1987年已译就两部论著即卡特（英文）著“荷属东印度的华人经济地位”和游仲勋著（日本）“华侨经济论”。目前这两部书也正在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印刷，不久即可出版发行。我们认为将当代著名华侨华人史及问题的中、外论著加以出版，对我们了解世界华侨华人史及现状，提高我们研究质量，扩大我们的视野，及探讨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异同等等都是有帮助的。尽管我们在这项工作中遇到许多困难。首先是经费上的困难，但我们将尽可能努力将此工作进行下去，希望广大同行及会员们大力协助支持。

第五、近几年来，我省及我们学会员们在研究华侨史及华侨华人问题中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或称道的现象，主要有：

①把研究华侨历史及研究战后华侨华人的变化，特别是当前华侨华人社会的状况和问题结合起来。在开始恢复华侨史研究初期，我们曾经批评过那些把华侨历史的研究称为“抬死人棺材论”的错误看法。研究华侨历史的重要意义，上述廖承志同志的讲话已阐述很确切。现在随着国际及我国形势的发展，为了更好的为祖国当前四化建设及国际斗争及交往服务，在继续加强华侨史的研究同时，重视及加强当前华人华侨社会的演变及现状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②近两年来，全省及许多县、市（特别是沿海华侨较多

的地县) 纷纷组织了“华侨志”或“侨务志”的编写工作。我们认为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它应当是华侨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我们所接待及接触了解的情况看，各地参加编写华侨志或侨务志的同志热情较高，工作是努力的，但是他们在工作中发现及感到最困难的问题是资料、史料严重不足，有的无法编写。这件事恰恰说明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或主观的重视不足造成今天没有比较详尽确切可靠的资料来编撰本地的华侨志或侨务志。但是这工作已经开始，我们相信和希望今后能在同志们的努力下，早日把这一工作完成。

③有些单位和同志对三中全会我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海外华人或华侨资本在我省的投资（独资、合资）及三来一补的企业经营等进行调查研究，这也是一项极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这既可以使我们了解这些投资经营有那些成绩和经验，存在什么问题，需要改进，从而促进发展，也可以了解研究这些华侨华人资本的性质，流向及华人经济情况和动向。希望各地能据本地实际，加强这项调研工作。

④这几年来，我们学会及从事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中还有一个可贵的现象，这就是在四项原则的指导下，坚决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对历史及现状方面的各种学术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逐步深入的探讨。正如大家所知道，国内外学者无论过去和现在，对于华侨史，华侨经济、人物、社会党派、帮派，与当地革命运动及与祖国的关系，同化和认同，当前华侨与华人的区别、现状、作用、地位等等。由于不同的立场、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实际所处的环境及地位，所拥有资料的差异或全缺等等的不同，而存在许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论点或观点。这些问题，用“唯意志论”，“唯上

论”，“唯权威论”、“唯本本论”等都是不可能得到科学的结论和真理。因此通过“双百方针”的互相砌磋、探讨、从而实事求是地逐步取得科学的结论，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对外国及国外华人学者的论著，或来访问时交流探讨的问题，我们应始终坚持原则，不卑不亢，既向他们好的正确的东西学习，对不同的甚至错误的观点也应坚持原则，本着友好砌磋的精神，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既不能妄自尊大，也决不妄自菲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更加深入，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同志们，几年来，我们学会在广大会员的支持及努力下，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但距离党和国家对我们的要求，距离形势对我们的要求都有极大的差距。和兄弟省市比较，形势也是严峻的，他们在许多研究工作方面都走在我前面。我们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 科研队伍几年来有所扩大，但速度缓慢，特别是队伍老化，青年科研人员仍非常少，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有些机构虽建立起来了，但配备不到合适人员，有的由于编制，经费等限制，或领导重视不足，人员也无法增加，这是个普遍的现象，没有人，一切工作无从谈起，特别面对队伍的日益老化，如何进一步培养青年科研人员是我们今后要重视及努力想法解决的课题之一。

(二) 学会还没有很好发挥统筹安排协调和推动全省华侨史及华侨问题研究工作的作用，也无制定一个较为切实可行的科研工作规划。这既有主观也有客观的种种原因。因此，会员们的科研工作大都是在本单位或者出于本人自发、自选研究项目下进行。当然其中有部分是承担了国家及省级的科研项目。因此，学会还没有很好的起到协调及一些统筹

安排的作用。

③学会经费没有什么来源，现在主要靠省侨联挤出一点经费予以支助和维持。缺乏经费，因而我们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不能按时召开，无法常到各地调查研究，加强与会员联系，特别是无法把会员们的许多有一定水平的论著加以出版发行，这是我们深感不安的。如何来开拓经费来源，我们也希望会员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④学会没有专职干部，主要由常务副会长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处理各种会务工作。他们散居各地，而且都有自己繁重的工作任务，因而和广大会员的联系也较少，组织也不够健全。有一些该做的工作，我们都没有或来不及做等等。我们希望在这次会议中，广大会员对我们的工作多加提出宝贵意见和批评。以便今后改进。

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成立三年来，得到各级党组织及有关单位的领导关怀和支持，特别是省委统战部，省侨联、省社联的关怀和帮助。省侨联在克服不少困难中，拨出经费来资助我们的活动及出版工作，我们借此机会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希望和相信，通过这次会议，在新的第二届理事会的领导推动下，把我省的华侨问题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里程碑。

1987年9月12日

近代亚洲移民的经纬

郭 梁

移民或人口迁移并不是世界历史上的新奇现象。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民族迁徙或人口迁移无论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或是在国与国之间，都是屡见不鲜的。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后，随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曾出现过几次跨越国界、洲界的移民浪潮。特别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以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帝国主义时期的到来，更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国际移民浪潮。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欧洲移向美洲、澳洲的移民达到4,500万人至5,000万人左右，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中国，印度移向海外的总人数也达到了5,000万人以上，与欧洲移民的数量不相上下，在世界近代移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际移民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存在两个偏向。一是在传统上从来比较注重欧洲移民问题的研究，而对于与欧洲移民规模不相上下的亚洲移民则缺乏研究，有的研究甚至连亚洲移民的事实也没有注意到，^①似乎一谈到移民就是指欧洲移民迁移到新大陆，反映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之深。另一种偏向是忽视了在世界移民史的总体范围中去考察研究国别或地区移民，往往把移民史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海外延伸内容去研究，只偏重于从移民国的内部因素去探讨移民诸问题，结果也同样限制了对一个国家移民问题本质的认识。例如有学者在谈到中国近代移民高潮时认为：“1842年之后华人的大

量移民，无论如何，并非由于英人和其它欧洲人独特的活动；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本身的崩溃。”^②显然，这种看法过份强调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因素，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对近代中国移民出现所发生的决定性作用，值得商榷。本文试以亚洲主要的移民国家印度、中国以及日本为例，探讨亚洲移民在近代世界移民史上的地位，以及亚洲移民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关系，亚洲移民的性质与特点。

一、印度移民

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悠久的对外交流的历史，因此印度人出国的历史亦可以追溯到印度古代历史，但作为资本主义劳动力移民，则开始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后半期以后，特别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印度移民达到了高潮阶段。据统计，1834年至1937年的百余年中，印度的海外移民总数达到3,019.1万人，其中1834年至1860年的印度移民为1,712,000人，每年平均移民65,846人，而1861年至1937年的76年间，印度移民达到2,848万人，年平均移民数达374,736.84人，^③成为亚洲最大的移民国家。

（参看表一）

第一表 印度移民人数 (单位: 千人)

年 份	出国者人数	归国者人数	净移民数
1834—1860	1,712	1,230	481
1861—1870	1,769	1,372	396
1871—1880	2,740	2,191	549
1881—1890	3,006	2,412	593
1891—1900	4,288	2,804	1,484
1901—1910	3,292	2,439	854
1911—1920	4,570	3,735	835
1921—1930	6,060	5,073	988
1931—1937	2,755	2,848	-93
合 计	30,191	24,104	6,087

资料来源: Davis: The populat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 Princeton, 1951, P99

印度之所以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向外输出劳动力，到十九世纪后半期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完全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结果。

第一，从国际背景来看，以1833年英国颁布南美殖民地解放奴隶法令为肇始，法国于1848年，秘鲁于1855年、美国于1860年，荷兰于1863年、西班牙于1870年都先后废除了奴隶法令。为了填补奴隶劳动力的“真空”，英国殖民者在自己管辖的殖民地印度大量招募劳动力送往种植园。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的竞争日趋尖锐，英国资本在其殖民地经营的初级产品如砂糖、